

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踩着相似的韵脚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新型现实的“数字存在”，其运行逻辑和吊诡之处就在于“让你自由，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”。

毋庸讳言，我们的生活早已深度嵌入“数字基建”，数字化的全域渗透成为我们生存的“数字刚需”。每个人时刻都被“数字逻辑”所牵引、规训和工具化：算法捕获、算法推荐、算法茧房、追踪识别、无痕采集，你无法不被“征用”，甚至连个体叙事和“退出权”也被算法劫持。乔治•奥威尔的《1984》仿佛在此重现。“数据连接”异化为一种数据殖民，数字平台蜕变为一种技术封建主义，平台与用户变成数字领主与“云农奴”关系。

舒茨早就预言“技术中介化危机”正在全面吞噬人类的生存根基：时间暴政、人际幻觉和全景监控。伯格曼悲叹技术生活世界“意义维度”的消失：空间扁平化、时间碎片化、关系中介化。当空间失去故事、时间失去过程、关系失去温度，这种缺少真实体验的浮游感、失重感的“点状”生活必将日渐僵尸化。罗萨从社会加速主义视角指出了“新异化的诞生”。大卫•诺贝尔警告说，数字技术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、权力关系和生存境遇。人们以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方式让渡了数据控制权，数字囚徒、身份焦虑、主体坍缩等主体性危机骤然而至。

显然，数字压迫是技术、资本和权力“共谋”的结构性压迫，平台资本逻辑、算法权力结构、数据治理规则等构成了系统性的碾压。其根源是制度性和共构性的数字异化，如算法霸权、数据垄断、平台宰制、合伦设计缺陷等。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。经典不会过时，它们时常会被问题唤醒或激活，在某个历史场合重逢对话。思想家们祭出了抵抗压迫、重建数字人文主义、守护人类主体性的“法宝”：布伯要复兴“我—你”关系、利科在重构叙事主体性、韩炳哲在守护他者的他异性。迪朗说，既然人与技术是互构关系，那么我们对技术也就不要太顺从。制衡技术封建主义的力量是拒绝成为数字臣民的人。加缪直言，所谓清醒就是亲手砸碎他人为你定制的生存剧本。

汤姆森指出，现代技术的最大风险不是“技术失控”，而是“人类主动放弃主体性”。技术从来不是命运，它是被塑造的秩序。庄子的“逍遥”和海德格尔的“诗意栖居”，本质上都是一种退守性的“自由”。真正对压迫的拯救是“建设性的自由”。西蒙东主张让技术真正融入人的生存世界；罗萨开出了“人与技术共鸣”的药方；弗洛姆倡导超越“占有”的“存在”生活；伯格曼和斯蒂格勒呼吁祛除现代奴性，在参与中建构意义，在实践中联结，与真实生活联结，以抵抗“精神无产阶级化”“意义的殖民化”；梅棹忠夫提出的对抗技术异化的“技术缓冲层”构想、罗梅莱的“技术想象、直言反抗和数字诠释素养”，以及项飙的“回归附近”等等，都是“守护人类在技术文明中的主体性”的呐喊与理路。

马克思技术观的人学向度揭示，技术异化的根源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，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异化，寻求技术异化解放的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。弗莱雷指出，教育即政治，教育即解放。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被压迫者打破“沉默文化”，形成批判性意识，获得改变现实的勇气和能力。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解放是“双向解放”，是双方共同摆脱“非人性化”状态、重拾人性的互动过程。

数字时代的“压迫与解放”是一对张力。它既不像想的那么好，也不像想的那么糟。其实质更像《罪与罚》结尾所道：这已经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。